

疫情突然来袭不知所措?求职升学失利压力山大?职场商场不顺自信受挫?婚恋家庭纷争焦头烂额?……天津市安定医院副院长徐广明说,近年来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备受社会关注,网络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很大。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上心理健康咨询、亲密关系修复、陪伴倾听倾听等都成为商机,但服务质量却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平台上有偿心理咨询、诊治从业者没有资质,一些平台打着陪伴倾听、哄睡叫醒等幌子提供“软色情”“擦边球”服务,还有些平台上相关服务纯属坑钱套路,毫无效果甚至有害,消费者被侵害后维权困难。



各种“不靠谱” ■新华社发

## A 线上心理服务需求大、问题多

据专家介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网络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咨询、诊疗等服务需求明显增大。据了解,当前市场上相关服务主要有3种类型。

“线上医院”,其实就是把线下医院搬到了线上。由第三方平台或专业医院运营,精神专科医生在线为用户提供咨询、药品续方等服务。这类平台上的医生绝大多数资质齐全,规范性强。

记者见到,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上,有来自浙江各地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入驻,平台清楚标明医生身份、专业以及收费标准和咨询量、反馈等,患者可以通过视频或者图文复诊。

“付费内容”。记者在多个知名网络社交、短视频平台搜索到大量付费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调节干预课程。

记者在某App体验“带你疗愈焦虑症”付费内容,发现其内容大多为舒缓情绪方法和“心灵鸡汤”,

与医学疗愈无关。有购买者留言称其“效果存疑”。

“有创作者专钻平台监管空子,他们不关心内容科学性,最大化牟利才是真正目的。”一名资深网络内容创作者告诉记者。

记者还发现,部分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所谓“情感咨询机构”以“心理咨询师”名义,提供“分手复合”“挽回婚姻”等干预服务,一些网购平台也出售“情感挽回、出轨分离、婚恋修复”服务。还有些机构和个人则自称为“亲密关系咨询师”“亲密关系修复师”等,通过手机App有偿提供服务。

还有人提供线上陪伴倾诉、哄睡叫醒等“轻”心理服务。记者在淘宝平台发现有不少名为“树洞”“虚拟恋人”的店铺,下单后工作人员将添加客户微信或QQ,根据要求计时聊天、哄睡陪伴等。

“此类行为监管难度大,出现‘泛黄’或‘涉黄’情况较多。”一位网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 坑钱又侵权 你敢让这些“心病”人治“心病”?

## B 网络心理健康服务市场有各种“不靠谱”

“当前网络心理健康服务缺少相应标准,不少求诊者或咨询人对相关风险不够了解,所以常有人被坑了钱还耽误诊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郭磊说。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该领域确有几类“不靠谱”。

——假证,从业资质不靠谱。一些平台鼓吹自己的“名师”具有美国职业教育学会颁发的“ACI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证书等。但记者在淘宝平台发现多个制售假冒心理咨询师资质证书的卖家。一个名为“su”的卖家称可制作“ACI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证”“APEI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证”,每本售价260元,1天可取。

——蒙人,专业身份不靠谱。“不少平台对所谓‘咨询师’几乎不设置专业门槛。”一位曾在多个平台兼职过的“咨询师”向记者透露,一些平台上甚至存在原本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倾诉者自学“套路”后注册为咨询师的情况。记者还发现,不少平台存在“刷好评”误导咨询者的情况。

——“坑”钱,服务质量不靠谱。记者在某网络社交平台向一位情感咨询机构负责人咨询“情感修复”服务情况。这名负责人表示“情感挽回成功率达到98%,先交完一周的998元咨询费用后,会研究并给出方案。”一名曾在该机构购买同类服务的消费者告诉记者,自己交费后一周,仅获得2小时电话咨询,一些公开可见的信息材料,当自己提出疑问时,该机构工作人员只给她一个“等”字。

另有咨询者投诉称,一位名为“国土九颜”的“情感导师”收取服务费后便只用一些“水话”来糊弄自己,对承诺的心理疏导分析服务均不兑现。

——侵权,权益维护不靠谱。记者发现,有多名咨询者投诉名为“暖暖情感咨询”的网络账号。投诉者称,该机构在与咨询者因咨询效果发生纠纷后,以曝光咨询者隐私为由挟咨询者继续交钱。还有咨询者表示,自己在淘宝平台上购买心理咨询服务,随后被所谓的“咨询师”公开了各种隐私聊天记录。

## C 加强监管是行业发展、市场拓展必经之路

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毛洪京等多位专家表示,网络心理健康服务行业有广阔前景,但目前正规医院网络医疗服务力量投入不足、相关线上服务诊疗与服务缺少标准、商业平台服务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应予高度重视。

毛洪京表示,受限于现实条件,医院很难自建自营网络服务平台,未来“商业网络平台+专业医院”是大方向,但是对从业门槛、资质、收费标准等细分领域的行业标准必须尽快制定规范。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教授表示,心理咨询属于

广义上的治疗行为,从业者应有相关资质。一些倾听服务和心理缓解咨询活动虽非医疗行为,但也应要求对从业人员实现平台后台实名制。

“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是不同的概念,需要准确评估咨询人心境和现状,而线上信息获取能力有限,对从业人员能力要求更高。”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安莉认为,应对线上心理咨询从业人员设立比线下更高的专业审核标准。

对于相关网络平台责任,薛军强调平台应加强相关从业人员资质审查核实、披露备案,同时需要建立真实有效的用户评价机制。“平台把好入门关,不能

任由虚假信息‘横行’。另外,对有特定严重违法记录及恶习的,应限制准入。”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臧雷提醒,对一些平台上打着心理健康幌子的“软色情”信息,平台负有法定监管、清理义务,如为流量或短期效益“视而不见”,则涉嫌违法甚至犯罪。他建议各平台为网络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尽快针对该领域完善监管规范,加强治理力度。

徐广明强调,网信、公安等部门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加强求诊、咨询者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力度,拉紧行业底线。(据新华网)

# 服刑相当于住宾馆? 狱中“帝王”牵出93名“保护伞”

“我们盯他的时候,他也派人盯我们。”山西太原“小四毛”任爱军涉黑案专案组一名负责人说,侦办案件的近一年时间里,他每天回家都小心翼翼,不敢去家和单位之外的任何地方。

“70后”任爱军是山西黑道赫赫有名的人物。20多年间,他多次入狱,两次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他在狱中住单间、开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享受“帝王”待遇,还管7次违规减刑。2018年,“小四毛”黑社会组织再次被打掉,牵出93名“保护伞”,山西省监狱系统的领导干部为此“倒下一片”。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这起罕见的涉黑型、系统性、塌方式司法腐败窝案,给我们敲响警钟:要加强“高墙内”执行环节监督管理,避免非法减刑、纸面服刑。

## 服刑相当于住宾馆

在监狱里住单间、设小灶、用冰箱、玩电脑、用手机,甚至还有专门储存东西的仓库,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成为任爱军服刑期间的“常规操作”。“他服刑相当于住宾馆,别人都是服务员。”办案人员说。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嗜赌成性的任爱军在狱中甚至还用电脑参与赌博,涉及赌资上千万元。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任爱军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导致全身90%面积烧伤。

1972年出生的任爱军别名“小四毛”,是山西臭名昭著、全国广泛关注的黑社会组织主犯,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太原的黑道“新贵”。

据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证,任爱军1988年4月即因伤害他人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1994年12月又因参与抢劫、故意伤害、流氓犯罪,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5年9月,任爱军保外就医后,纠集满释放、解教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开设赌局、聚众赌博以聚敛钱财,并逐步扩大组织规模,购买枪支弹药和车辆,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殴打行政执法人员。

2003年,被告人任爱军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13年6月28日提前减刑释放。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朱万君说,任爱军二次出狱前,积极笼络其他服刑人员,出狱后又迅速纠集、拉拢张天舒、任晓浩、张贵保等多人,以亲友、狱友等为纽带,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继续获得经济利益,树立强势地位,再次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办案人员介绍,任爱军借用善林资产管理公司和其实际控制的山西仁嘉实业公司、北京云奇峰资讯科技公司、崞县集通集运公司等名义,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非法侵入住宅、帮助毁灭证据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并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动。

“任爱军第二次出狱后违法手段相对隐蔽,

从过去的暴力抢掠、伤害,演变为利用自己恶名威胁他人的‘软暴力’方式,并打算依靠公司运作来洗白自己的身份和黑资产。”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国涛说。

2018年2月,山西省公安厅对外通报,以任爱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被太原警方再次成功打掉。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缴获枪支7支及大量管制刀具、电警棍、对讲机等作案工具,冻结追缴涉案资金1444.2万元,查封北京、太原等地房产25套,扣押轿车13辆。

## 把“减刑”用到极致

2018年3月初,山西省委政法委接省、市两级公安机关报告和群众举报,反映“小四毛”任爱军在1994年和2003年两次服刑期间,存在内外勾连、弄虚作假、枉法减刑等问题。

相关部门随即成立专案核查组,正式开展核查工作。经过对任爱军两次服刑期间的七次减刑逐一复查,发现每起减刑均不同程度存在伪造立功材料、虚构在监表现等情形;相关政法单位在此过程中,也不不同程度存在弄虚作假、虚位监督、徇私舞弊等问题。

1994年,任爱军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任爱军上诉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在其对虚假立功材料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6年。在任爱军首次服刑期间,太原市第一监狱为其出具虚假保外就医意见和重大立功材料,先后保外就医1年、减刑2年6个月。任爱军入监服刑时间仅7个月。

2001年,任爱军因涉嫌绑架罪被逮捕,2003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7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在汾阳监狱、晋中监狱、临汾监狱、曲沃监狱服刑改造。

调查发现,任爱军服刑期间把减刑用到了极致,基本上是能减必减,且每次都是顶格去减。他申请减刑的方式有两种:监狱改造获取积分和重大立功。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从入狱到出狱,任爱军有4次常规减刑和两次重大立功记录。

“正常来说,重大减刑后,两年之内不能第二次提出。任爱军则交叉进行,利用积分减

刑后,马上换地方,再进行立功减刑。”专案组有关工作人员说。

任爱军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前妻张天舒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在他服刑期间,张天舒在外到处奔走、筹集资金,协助违规减刑事宜。

律师郝某则通过检察院有关领导,认识山西省监狱管理局时任分管副局长、负责减刑相关处室的处长,又通过其他老乡,不断打招呼。经过关照,任爱军在监狱里表现糟糕,积分却多到用不完。

殴打服刑人员王某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借此调升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刑期由无期徒刑为18年。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需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点被任爱军充分利用,逢换必减。

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相关伪造的减刑证明材料,提请将其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临汾监狱以晋中监狱认定的任爱军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提请对罪犯减为有期徒刑3年。

常规减刑不到期,任爱军就申请重大立功。2011年,任爱军检举了一起狱外命案。事实上,这起命案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别被同监狱的犯人检举过,等到任爱军检举时,监狱才将材料转到公安部门。别人举报过的事,又成为任爱军重大立功的理由。

在服刑期间,任爱军不服管教,严重违法违规,充当牢头狱霸。对其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监狱不仅不予惩处,反而多次为其记功、表扬,报请减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对相关减刑材料审查把关不严,将任爱军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8年;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法官徇私枉法,分别三次裁定减去其有期徒刑1年8个月、2年、1年10个月23天。自无期徒刑判决生效至2013年6月刑满释放,任爱军实际服刑仅10年2个月。

专案核查组核查,狱考结果不符任爱军服刑期间现实表现与监、记功、减刑、重大立功等涉嫌造假。

2018年9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撤销被告人任爱军减刑的刑事裁定,对其恢复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9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任爱军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与先前所判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被告人,根据所犯罪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到2年6个月不等的刑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决。

## 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程序违法被发现的风险

对任爱军违法减刑问题调查过程中,专案组发现,相关政法单位不同程度存在弄虚作假、虚位监督、徇私舞弊等问题。

2018年4月,山西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深挖“保护伞”、严惩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山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迅速协调省纪委监委,启动涉黑涉恶“保护伞”及腐败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严肃查处任爱军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及腐败问题。

任爱军涉黑案件查办期间,山西省委政法委共召开专题会议7次,多次赴5市30多家单位调查,调阅案卷材料50余卷,谈话调查60余人,制作谈话笔录30余份。

经查,任爱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共查处涉案违纪违法人员9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91人,律师1人,其他社会人员1人。国家工作人员中,监狱系统58人、法院系统15人、检察院8人、公安系统10人。

山西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这是一起监狱、法院、检察院、公安系统人员和“黑”律师交织的司法腐败窝案。

目前,查处人员中有12人涉刑事犯罪,其中4人为厅级干部,案件均已审判终结,相关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8年6个月不等刑罚;另有32人被告人被给予党纪政务撤职以上重处分,47人被给予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任爱军违规减刑窝案,暴露司法系统部分领域“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为滥用职权提供土壤。部分领导干部知法犯法,以程序规避监督。

以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为例,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多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

办案人员表示,时任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小四毛”办理减刑材料。

“曾经的坚持原则,让步于打招呼请托,导致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为‘小四毛’违规减刑提供了帮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高奇在忏悔书中写道。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减刑必须公示,接受监督。任爱军在汾阳监狱不服管教、严重违法违规,充当牢头狱霸等表现,全监狱人所共知,如果在本监狱公示,必遭质疑。

为规避“风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将任爱军调拨到晋中监狱关押,并指令由汾阳监狱准备减刑材料,由晋中监狱提出减刑意见。最后,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相关伪造的减刑证明材料,提请

将其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与监狱管理局里应外合,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程序违法、作假被发现的风险”。任爱军其他数次常规减刑和重大立功减刑,也都是利用这种手段。

按照程序,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执行机关首先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然后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专案组工作人员表示,在任爱军等人色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一些民警为了得到蝇头小利,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给其使用电脑和手机提供便利,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有的民警甚至以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劳,甘当“马前卒”,竞相主动为他办事。

## 避免扫黑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多年来,公安部门侦办、法院审判的案件中,除正常的监督机制外,还面临受害者、原被告和社会的监督。而执行的环节处在“高墙之内”,缺少社会和被害者的监督,一旦程序监督失灵,枉法现象将难以避免。

近期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也都是如此,他们同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社会视线难以关注到的“高墙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使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依法送交监狱执行刑罚,或者在送交之后不久就被“保外”出狱,造成判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纸面”上完成。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大批黑恶势力人员将被刑拘投监,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避免公平正义在“高墙内”退步,保障扫黑效果,必须加强监狱等执行环节的监督管理,让阳光照耀“高墙”,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

办案人员表示,任爱军在每一个监狱服刑期间,均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却频繁被监狱给予记功、表扬,并确定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为避免在本监狱提请减刑引起其他民警和服刑人员愤慨,省监狱管理局遂按照这项不成文规定,将任爱军先后三次调换服刑关押监狱。

山西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任爱军利用虚假记功、表扬、重大立功等实现七次减刑,集中暴露了执法司法工作中的漏洞,必须完善“不能腐”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坚决杜绝减刑假释等环节出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确保做到对所有犯罪分子不姑息、不放纵。

(据新华社)